

中国的低生育水平与 被忽略的人口风险

China's
Low Fertility Level and
the Neglected
Population Risk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北大社会学·教授自选集系列

郭志刚 著

中国的低生育水平与 被忽略的人口风险

China's Low Fertility Level and the Neglected Population Risk

郭志刚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的低生育水平与被忽略的人口风险/郭志刚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4
(北大社会学·教授自选集系列)
ISBN 978-7-5097-3110-9

I. ①中… II. ①郭… III. ①人口—问题—中国—文集 IV. ①C924.2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08978号

北大社会学·教授自选集系列

中国的低生育水平与被忽略的人口风险

著 者 / 郭志刚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责任编辑 / 郑 燃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责任校对 / 刘玉清

项目统筹 / 童根兴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7.25

版 次 / 2012年4月第1版


字 数 / 476千字

印 次 /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3110-9

定 价 / 69.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我的低生育率研究历程（自序）

躬逢其盛，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即将庆祝建系 30 周年。本系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策划要为资深教授出版自选论文集。我考虑再三，选择了十几年来我就中国低生育率和人口发展战略方面研究的 30 篇论文。这不仅是因为十几年来，我在这些问题研究上花费了大量心血，而且认为这些研究结果有助于增进对当前人口形势和未来人口发展趋势的认识。再有，总结我自己研究思路的产生、思想认识的转变和学术观点的形成可能对年青一代学者有一些启发作用。此外，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在我进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十多年时间里完成的。我想用这十年的研究成果来感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给我提供了一个得以平心静气、潜心钻研的良好学术环境。

一 前言

我的研究主要是定量的人口统计研究，但是在学术探讨中也涉及研究方法论和思想认识问题。最近十年来，我主要的研究关注一直紧密围绕在中国的低生育率问题。我的代表性观点可以简单地归纳为对两个基本人口指标判断的质疑。这两个判断都涉及生育率，而且这两个判断所涉及的具体生育率水平都是 1.8。

首先，近年来我一直在质疑人口主管部门对人口形势的判断，即人口和计划生育宣传和规划中长期沿用的 1.8 生育率。

我一直很坚决地质疑当前生育率为 1.8 的形势判断，甚至显得不依不饶。我这种表现其实与我本人真正的个性反差很大，完全是因为事关重大，不得不坚持。我的研究表明，2000 年时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就很可能已经处

于1.5以下了。由于我坚持认为生育率可能很低，曾被前国家人口计生委主要领导称为“乐观派”。其实我不仅一点也不乐观，反而忧心忡忡，承受着很大的心理压力。这倒不是因为害怕自己的观点被证伪，要是那样，我只要老老实实承认学术研究有误，面子上不好看而已。我真正担心的是，如果实际情况真被我这个乌鸦嘴“不幸言中”，就意味着政府主管部门对人口发展出现了严重的判断失误和时机贻误。事实上，我自己一直在认真研读所有能找到的新的调查材料和研究成果，小心翼翼地用更广泛的研究和更多的数据不断地严格检验自己的观点。但是结果表明，这种观点并不能被证伪。而对立观点的一些很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在检验中却总是能被我挑出方法和数据方面存在重要缺陷和错误，实在没法令我信服。读者可以从后面的论文中看到这方面的分析和讨论。所以，我不得不继续坚持我的观点。

其次，最近两年我又开始公开质疑1.8的生育率是未来30年人口发展的适度生育率的判断。

1.8的生育率是未来30年人口发展的适度生育率，也是一个权威判断，被写入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总报告》。其实，早在2004年启动这项国家人口战略研究时的一次重要的座谈会上，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华建敏同志曾问过在座的人口学者，中国人口长期发展以什么生育率水平为好，几位学者都认为1.7的生育率比较好。而我则表示有不同意见，认为作为长期的生育率控制目标，1.7的水平太低了。然而我当时并没有很好地研究过这个问题，所以无法给出具体的目标水平建议，只好表达为“1.8、1.9、2.0，只要低于更替水平就行”。回来以后我就想，我与其他学者为什么会有不同，当时能想出来的就是我们之间在实际生育率的判断上有很大差别。后来我又体会出，实际上这也反映出在人口发展战略追求的更长远目标上也存在差别。

在本论文集编辑完成即将交稿前，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布了。“六普”数据是对我国人口形势的全面的、权威的反映，同时也再次检验了以往人口形势判断的不同观点。所以，接下来我先简要解读“六普”主要结果到底揭示了什么。然后，我再反过头来简介一下我从事人口学研究的历程，以及本书所选论文的出炉背景。这样，读者不仅可以从每篇论文中了解到我的一些研究手段和结论，而且能够更多地了解我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些研究题目，以及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并没有在这些论文中明说的题外话和潜台词。这是一种更深入的学术思路交待，对于要从事研究工作

的年轻学者可能有一定启发意义。

二 “六普”主要结果的解读

“六普”结果表明：以往生育率被严重高估。

2011年4月28日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1月1日，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4亿。这个数字可能远远低于很多人的预料，然而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实际上，这个最新的普查数字只是再次印证了以往多次全国性人口调查早已揭示过的事实：即目前中国生育水平不是一般的低，而是非常低。所以，这个总人口数字表明全国总和生育率根本不可能是人口主管部门长期坚称的1.8，而是显著更低，甚至低于1.5。这种生育水平预示着，每对夫妇终其一生平均生育不足1.5个孩子。

五年前，人口主管部门在拟定“十一五”人口规划时，把2010年人口总规模定为13.60亿。这是在2005年总人口13.08亿的基础上，按1.8左右的生育率推算出来的。也就是说，按以往主流认识的1.8的生育率，2006年至2010年，中国人口数将增长5000万，年均增长约1000万。

然而，此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总人口比“十一五”人口规划数少了2000万。也就是说，此间中国年均人口净增长只有600多万而已，与人口规划数差了近400万。这已经不是一般的误差，而应视为一种重大的判断失误。而且，中国实际人口增长数显著低于人口规划数并不只限于“十一五”人口规划，还可追溯至“十五”规划和“九五”规划。这种规划目标和普查数据的反差证明，以往中国的生育率被严重高估了。

“六普”结果还表明：人口老龄化程度被低估。

“六普”公布的数据还表明，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3.26%，而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为8.87%。而以前根据1.8的生育率推算的2010年底的60岁和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分别为12.42%和8.18%。这种明显差异表明，以前中国人口老龄化事实上被低估了。实际上，这主要是以往高估生育率导致的必然结果。要是当前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就已被明显低估，再推算到更远的未来，低估偏差必然更大。

生育水平和预期寿命的变化是决定人口老龄化的两大主要因素。预期寿命的提高会使人口金字塔的顶部（老年人口部分）相对加大，称为顶部老龄化。而低生育水平则使人口金字塔的底部（少儿人口部分）相对缩减，

称为底部老龄化。不过，就中国人口发展而言，维持过低的生育率要比预期寿命提高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大得多。

多年来高估出生漏报和过度调整出生人口数，积累起来就会高估少儿人口数量，并且进而导致总人口数的高估。这些高估虽然并不影响老年人口数，但必然导致低估老年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而人口老龄化的本来意义并不是指老年人口绝对数的增加，而是指老年人占总人口比例的提高。

如果不能及时纠正人口形势判断上的失误，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应对，贻误生育政策调整时机，未来的人口老龄化将更为严重、更难应对。

过去三十年，在国家的人口规划中只设定了人口总量峰值上限，却从没确定过人口老龄化的峰值上限。因而，在执行中，控制人口数量的一手很硬，而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一手则要软得多，更没有明确由谁来负责。这种政策上的不对称，潜藏着人口老龄化失控的风险。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人口形势判断上的失误呢？不少人将它归因为统计数据失实，而我则不这样看。统计数据存在一定问题，谁都不否认。然而，我认为形势判断失误的主要原因要从主观上找，是由于人们的思想认识落后于实践的发展了。

20世纪90年代初，当生育率降至2.1的世代更替水平以下，中国人口发展史就开启了一个崭新的低生育水平阶段。但是，由于对这个重大的转变缺乏充分认知，官方人口统计就陷入了一个怪圈，即“见到低生育率调查结果→归因于出生漏报并调高生育率→继续严格控制→再次见到低生育率结果→再调高生育率→再继续严格控制……”。

这一怪圈始于对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结果的强烈不信任，认为调查得到的很低生育率完全不可信。然后，人口主管部门和统计部门就借助各种应运而生的出生漏报估计和生育率估计，把总和生育率“提高”到决策者能够接受的水平。这样一来，人口方面的认识和实践就陷在这个周而复始的死循环中出不来了。

应该看到，人口调查数据，尽管存在质量问题，已经一再揭示了很低生育率的到来，因此人口统计长期陷入迷茫状态就不能将罪过归于统计数据失实，而应该归于自己尚未很好地对低生育率进行研究，便武断地宣称如此之低的生育率在中国是不可能的，完全拒绝考虑它有可能是真实的，不再去认真研究现实中的导致低生育率的种种因素，从而关闭了走向正确认识的大门。

近年来有很多研究可以证明，中国与其他低生育率国家类似，也存在

着很多导致低生育率的原因，诸如女性受教育年限的增长、婚育年龄的推延、人均收入的提高、城镇化的加剧等。另外，导致出生性别比失调的胎儿性别选择流产也是导致低生育率的一个重要因素。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调查表明人们的生育意愿、生育行为，特别是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确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过去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已经在总体上被完全颠覆，再想让人多生都已经很困难了。

这些研究结果之所以未得到决策者重视，往往就是因为主管部门既不重视调查研究，又固守成见，总是把很低生育率的调查结果简单视为“虚假统计”。而根据人口调查数据所做的各种考察和分析，经常被指责为“假数真做”。因此，中国的低生育率之所以老是个谜，主要原因并不是调查数据存在质量问题，而是因为思想没有解放，对人口发展的新现象、新问题视而不见，结果作茧自缚。这实在是可悲的事情。

“六普”主要数据已经揭示了很多问题，而下一步“六普”数据的全面开发研究更能增强各方对中国人口形势的把握。对本次普查的调查质量，当然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评价。但是，千万不要再次陷入此前的人口统计怪圈。

“六普”结果引发了各方面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热烈讨论。这只不过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中国人口发展和生育政策的契机。而人口问题的真正破局则靠决策者破解低生育率迷思后，积极主动地调整生育政策的实践。

三 我走进了人口学

20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大力推行计划生育。十年之间，中国的出生率从30‰以上迅速地下降到20‰左右，总和生育率从接近于6.0的高水平下降到2.5左右。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学科调整，人口学研究被基本中断，所以20世纪70年代时国内还不会使用总和生育率这样的指标，也没有全国性的生育调查数据可用。上述生育率指标是根据1982年全国1‰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数据回推的。

进入20世纪80年代，应实际工作的急需，人口学学科得以恢复。在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支持下，全国高校系统和其他系统纷纷建立了人口研究所，并且选派人员出国留学和进修，系统培养人口学人才。我本人便幸运成为其中的一员。

1981年时我正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管理系攻读本科，而本校的人口研究所是全国最有名的人口学研究中心。经过人口研究所的选拔考试，我作为联合国人口基金奖学金候选人，先参加了国家教委在四川大学举办的人口学留学人员进修班，然后于1983年被选送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社会学系读了两年研究生，在那里学习了社会学、人口学、统计分析等方面的课程，奠定了理论和方法基础。取得硕士学位后，本来是有条件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但由于派出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一再发函要求尽早回国分担研究和教学重担，于是由本所派出的罗茂初、翟振武、郝虹生和我都相继结束了留学生涯，陆续回到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担任教学和研究工作。稍后，又开始在本单位在职攻读博士学位。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是全国人口学教学和研究中心，我在这里身处很好的学术氛围，有老一辈人口学家刘铮、邬沧萍、查瑞传、林富德等老教授的言传身教，所里又不断邀请国际人口学界著名学者来做短期授课，一班师兄弟也都是好学勤思之人，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提供了不少专业图书和电脑设备，加上教学相长，我在这里打下比较坚实的人口学和统计学基础。

进入人口学研究之初，我主要从事家庭人口学研究，这同时也是我的博士论文研究题目。取得博士学位后，我又去美国布朗大学人口研究与培训中心做了一年多的博士后研究，同时对博士论文加以完善和补充，1994年回国后正式出版了我至今唯一的研究专著《当代中国人口发展与家庭户的变迁》。

在我留学回国之前，计划生育领域已经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比如，1980年发表《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以后，计划生育的限制要求相应收紧，全国曾一度广泛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然而，全面推行独生子女政策不仅没有带来预期的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反而出现了一些工作上的混乱和生育水平的徘徊。于是，1984年又出台了“开小口子”的中央文件，要求放松前一段过严的生育限制。然而，这些生育政策变化引发了当时人口学和计划生育领域中十分激烈的争论。

1985年刚留学回国以后，我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搞不清楚争论的实质是什么，只知道一些人要求坚持普遍推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严格政策，而另一些人则主张根据国情实行稍为宽松的政策（比如在农村实施二孩政策或二孩加间隔的政策）。当时，大部分中青年人口学者实际上更倾向于后

者，这种情况充分地反映在1987年、1988年和1989年的三次中青年人口学者全国“人口与发展”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中^①。当时我本人虽然也是如此，但这更多是出于感性的选择，并没有更为深刻的实际研究和理论思考。

直到最近几年，在阅读了更多关于人口发展战略的研究文献后，我才能理解到，这一时期的争论不仅是计划生育早期阶段要采取的策略之争，而且也隐含着中国人口发展长期战略的目标之争。

四 转向生育率研究

正当我在国内家庭人口学领域略有建树之时，1996年邬沧萍教授对我有一番语重心长的谈话，开导我应该扩展自己的研究方向。邬老师说，中国人口学之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起成了热门学科，是因为计划生育成了中国的基本国策。人口预测是反映人口发展前景，是制定人口规划的基础；其中对生育率的人口学研究分析对于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尤为重要，因为它不但为计划生育工作提供形势监测，还提供了未来人口发展趋势和重要参考信息。他的话深深打动了

我。自己回国后所做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家庭人口学，虽然也参与了一些其他方向的研究，但大体上确实与时下最热点的人口问题争论保持着一定距离，比如像生育率、人口政策的这些热点问题，自己虽然也有一些研究成果发表，但因为缺乏深入研究，不过是一些泛泛的议论。身处中国社会经济和人口方面的巨大变革，我却仿佛置身度外，虽然家庭人口学同样要求理论和方法方面的学术建树，但毕竟距离人口转变大潮的中心旋涡较远。可能由于内在性格使然，我怯于激烈的直接争论，更愿意在平静的学术象牙塔中潜心雕琢。平心而论，自己是有精力和能力投入这些热点问题研究的，应当力争作出一些贡献，以尽到学者的社会责任。否则，真是辜负了这个伟大变革的时代。

带着一种使命感，我开始有计划地研读更多的生育率研究文献，收集和整理有关数据，尝试不同的生育率指标和方法的模型。并且，也开始学习高级编程语言，尝试编制不同方法的人口分析和预测程序。

大约花了三年时间，我才基本把握了当时主要的生育率分析手段。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开始发表自己对中国生育率和人口发展的研究论

^① 《中国人口问题思考》编写组：《中国人口问题思考》，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杜亚军等主编《中国人口的困境与对策》，中国人口出版社，1991。

文。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研究一项一项地做出来了，自己对于中国低生育率的认识也一步一步得到了深入。

五 学术观点的转变

我1994年在美国完成博士后研究后，刚一回国便感受到人口学与计划生育工作领域的一种新的氛围。1992年国家计生委组织的“38万人调查”取得的总和生育率第一次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而且水平之低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对于这种结果，整个人口学界和计划生育领域一片质疑和否定之声，认为生育率这么低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于是，就把低生育率结果归结为由大规模的出生漏报和统计数据严重失实所致。

当时我也不例外，也认为这种低生育率结果根本不可信。本书所选的第一篇论文《新形势下对中国人口发展的思考》便反映了我当时的认识。当时我自己也严厉批评对计划生育成绩的盲目乐观，强调在相当长一个历史阶段中，人口数量仍是中国人口问题中的首要问题，并且反对从放松计划生育控制来缓解人口老龄化。这样的观点其实正是我后来与之对立的学术观点，至今甚至还可以被称为主流观点。

后来我的学术观点为什么会发生重大转变呢？这主要是由于我后来开展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证研究，使我对中国人口问题产生了新的认识。

本书所选的《人口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理论中有关问题的思考》一文主要从“人口”这个概念入手，反对“人口是可持续发展的中心”的说法，也就是反对“人口决定论”。而这种说法当时在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上上下下都很盛行，因为这时计划生育原来的基础理论“两种生产理论”已经明显不适应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形势了，所以计划生育开始引进国际上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来作为理论依据。出自一种强调计划生育重要性的本能，人口学和计划生育部门当然愿意突出自己这一摊工作在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性。然而，这种表述显然是过头的，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也不符合国际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表述。在一次重要会议上，我公开表示反对“人口是可持续发展的中心”这种说法，并陈述了自己的理由。后来我又做了更多文献研究，形成了这篇论文。在批评别人的同时，也就清理了自己，我开始发现当时很多认识和说法其实都是似是而非的。

接下来《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初步理论思考》一

文，是我开始尝试构建一个理论框架，并提出在处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经济过程中，生产方式是主要矛盾方面，因而在解决人口资源环境问题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极为重要。并且，开始认为“人口的控制或调节是很有限的，所以不能作为无限的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动力”。

此外，亲自从事生育率方面的数据研究使我逐渐增强对人口数据的把握及对其中反映出来的低生育率的理解。在研究生育率的时候，我并没有将研究局限于常规方法的生育率分析，而是尝试用更多不同的生育率模型来进行研究。比如，在我取得了1997年生殖健康调查数据后，《中国近期生育水平的胎次递进研究》的论文是采用了美国学者Feeney在1980年代早期创建的孩次间隔别递进生育模型来进行分析的。后来的《时期生育水平指标的回顾与分析》和《从近年来的时期生育行为看终身生育水平：去进度效应研究》两篇论文则是采用Bongaarts和Feeney在1998年提出的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模型。前者介绍了这一方法的用途与原理，并应用于1950~1997年的全国分年龄孩次别生育率数据，来考察这一方法是否适用于中国的情况，发现对比常规总和生育率和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的差别提供了对中国生育率下降的阶段性的很有新意的解释。后者则侧重于说明这个新方法可以得到对终身生育率的更好估计，并且证明了生育年龄推迟这种时期进度效应是导致1990年以后的常规总和生育率很低的重要原因之一。于是，我就通过比较多种生育测量指标的方法探测到低生育率的腾腾雾水之下的第一块实打实的大石头，开始意识到“即使考虑调查中有出生漏报，进度效应幅度与漏报影响相比也不能忽视”。换句话说，就是当下的低生育率并不能简单地用出生漏报来完全解释。

六 政策生育率研究

从1998年开始，我与顾宝昌、张二力、王丰等人开始合作，研究中国的生育政策与生育率的关系。现行生育政策包含了分类实施的原则，其中同时并行多种不同的生育政策要求，大致可分为四类，包括独生子女政策、一孩半政策（即第一次生育如果是女孩便可再生一个孩子）、二孩政策，以及三孩以上政策。尽管计划生育早已取得基本国策的地位，然而由于生育政策类型较多，对于现行生育政策所要求的生育水平到底是多少这样一个重要指标却一直缺乏比较准确的估计。开展这个研究得到了国家计生委的鼓励和支持，有关数据也是各地计生委上报汇总的。这个研究报告是由我

承担分析并执笔的，在2001年就完成了，当时向国家计生委领导做了汇报。国家计生委肯定了这项研究成果，但同时要求这个研究报告要暂时保密，只能作为内部参考资料，不能公开发表。直到2003年，国家计生委一名副主任指示这篇研究报告可以对外发表了。这篇研究报告发表时的标题定为“从政策生育率看中国生育政策的多样性”，意在表明中国的现行生育政策包括多种类型，而不是国内外一些人所指责的“一胎化”。然而，参与这个分析才使我知道，我国现行生育政策的要求很严，全国平均水平是一对夫妇终身生育不到一个半孩子，达到这个指标便意味着全国2/3的家庭只有一个孩子。

这时我注意到，调查数据显示的1990年代前期生育率的下降正是在向政策生育率的目标趋近，并在后来又下降到略低于政策生育率后，生育率便大体保持不变了。这时，我的头脑里第一次浮现出一个巨大的怀疑：调查数据所反映的很低生育率会不会就是真的？这个问题在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正逢开发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课题竞标，我以“2000年人口普查按生育政策类型的人口分析”题目中标，利用“五普”数据对全国及不同生育政策地区人口进行了多方面初探，可以明显看出不同类型的人口特征的确显示出与其所实行的生育政策十分相关^①。

在数据分析中，我还注意到我国人口调查数据中的生育信息并不限于计算当年的生育率，还提供了更多其他生育信息，比如育龄妇女的孩次结构信息，经过比较复杂的母子匹配数据处理，便能提供少儿人口中的独生子女信息，还能重建本次调查前许多年的生育史。经过多次修改和尝试，这种方法在开发人口普查原始数据时得到成功，计算出以往十年的生育率，不仅重建的生育率与直接计算的普查前一年的生育率大致吻合，而且还与以往历次调查的低生育率大致吻合。这个研究表明，人口调查数据的内部一致性并不很差，而且不同的人口调查数据之间也相当一致。

七 探索适当的人口预测模拟方法

2000年以后，我开始尝试亲手编程做人口预测模拟，为生育政策调整方案的人口预测模拟研究做准备。本来有不少现成的人口预测软件可用，

^① 该研究报告太长，本书没有收入。参见郭志刚《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生育数据分析》，载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课题论文集》，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第67~123页。

之所以要自己编程，目的是要在人口预测模拟中应用马瀛通等中国学者在1985年创建的年龄别孩次递进生育模型，以便在预测中更为贴切地体现中国人口国情。如上所述，现行生育政策实际上存在四种类型，生育限制要求差别很大，多年实行后不同生育政策地区必然存在巨大的人口差别。比如，在不考虑人口迁移流动的情况下，独生子女政策地区的少儿人口中将普遍为独生子女，已经生育的育龄妇女都只有一个孩子，人口老龄化程度更高，等等。因此，中国的人口预测不能无视这种差别。并且，生育政策的实际调整导致的人口增量主要反映在原来身为独生子女母亲的二孩递进生育量上。此外，我发现年龄别递进生育模型的这一性质还可以将功能进一步扩展，用于家庭代际结构变化的研究。

作为人口模拟研究的预演，2002年我发表了《我国现行生育政策与未来的家庭结构》一文。因为这时许多调整政策模拟的数据和操作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所以人口类型只是沿用了常规的城乡划分，并未按生育政策类型划分。只是假设现行生育政策长期不变，没有考虑政策调整。实际上，我在这方面的学习和实践也部分地受益于尹文耀教授的专著《21世纪中国人口系统模拟与决策》。《开展学术创新，推动人口科学》一文就是当时学习思考的一些心得，加上对尹教授专著的评论。

在2000年前后，一批人口学家感到，应尽快研究生育政策调整问题，并提出了生育政策研究的设想。2001年，来自全国各地的16位人口学者集中在一起讨论了人口与计划生育形势和生育政策调整的研究框架，分工承担了不同的研究题目。上述政策生育率研究和生育政策调整的多方案人口模拟便是其中的两项子课题。

2003年年中，生育政策调整的人口模拟研究在方法构建、数据准备和程序编制都已经到位，我们这个子课题组的成员集中在一起，成功地实施了多方案预测，取得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成果。2003年底，我们将人口模拟方法的构建思路与多方案模拟的初步结果向大家做了汇报。后来，根据大家讨论提出的一些意见，对模拟预测的生育参数做了一些调整修改，更新了模拟预测结果。于是，大家同意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份调整生育政策的建议。经过反反复复多次文本修改，2004年4月，18位学者联名签署提交了“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本书选入的《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人口模拟方法探讨》便是上述多方案模拟的方法篇，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人口预测模拟结果及分析讨论篇，直到2006年才对外公开发表，即本书中的《中国当前生育水平与未来人口展望》一篇。

八 生育率上的争论

2003年我参加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召开的一次中国人口学术研讨会。会上，我利用多种数据来源的生育率比较，第一次公开地提出中国的生育率处于1.5以下的可能性很大，并列举了大量统计和测算作为证据。那时公开这个观点，实际上自己也并不是很有把握，只是想通过学术交流听取意见，也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不要忽略了生育率确实很低的可能性。本来我以为这个观点会引起激烈争议，出乎意料的是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我的研究很有意义，还有一些学者在会上发表的研究成果是从不同角度取得了类似的结论。当时会议交流材料均上了互联网，因此在国际上的中国人口研究领域中也具有不小的学术影响。

2004年春，我在《人口研究》上发表了《对中国1990年代生育水平的研究与讨论》一文。这实际上是针对国内人口和计划生育领域长期无视人口调查多次反映的很低生育率，坚持沿用较高的1.8生育率估计作为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规划基本依据的状况，呼吁和强调很低生育率有可能是实际存在，而忽略这种可能性也会导致风险。

2004年初，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启动，课题办公室设在国家人口计生委。可能是因为我在2003年用年龄别孩次递进模型协助国家人口计生委完成的《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计划》目标人群测算结果较好，聘我承担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中的人口预测子课题。由于课题办公室要求这一战略研究的人口预测必须采用兄弟子课题对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的专项研究成果作为预测输入参数，而我对生育率的看法又与课题办公室及兄弟子课题不同，于是便产生了关于生育率水平的争论。本来我对生育率研究子课题最初得出的高中低三套生育率并没有任何异议，因为其生育率估计值也比较低。但是，在课题办公室召开了几次讨论会之后，三套生育率估计均被越调越高，才导致了我提出异议。其实，我并不反对将中位和高位生育率提高，因为当时我对生育率估计并没有那种高度自信，同时也能理解政府主管部门特别重视人口失控的危险，我只是希望将低位估计保留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并使高中低参数之间的差距增大，以便在做人口预测时不要忽视了生育率较低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就是力图使人口预测结果的覆盖面增大。筐做大些，才能装更多东西。实际上，我建议的做

法也是人口预测的常规，即越是在对参数没有太大把握的情况下，越应该扩大高低参数之间的差距。然而，连我这种折中的建议也被否定了。

因为这个问题并不是简单的学术观点之争，而是关系到指导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形势判断和将来政策取向的大事，我曾经专门给课题办公室领导写过一封电子邮件，坚持和重申我的意见：

我越来越不相信现在的生育水平还在 1.8。当然，到底是多高，没有第一手数据谁也说不清。我认为此次战略研究，这个问题是不可能水落石出了。但我们可以先综合不同意见，再加上一点保险系数来做预测。5 月时在中国五普国际研究会上见到美国东西方人口中心的金敏子（韩裔），她说韩国 90 年代 TFR 也是一路下降，一开始她们全都不相信，但是也找不出原因，甚至找不出漏报的原因（韩国没有生育指标）。但 TFR 一直持续下降，到 90 年代后半期时，韩国人和外国学者已经开始相信这是事实。并且，由于生育水平太低，韩国政府也开始着急了。

我之所以不断提出关于生育率很低的研究结果，主要目的是希望引起关注除了漏报以外的各种可能性。何况，中国政府与韩国政府不同，如果生育率降得太低引起未来发展产生严重问题，党和政府要负政策上的责任。责任还在其次，中国崛起的努力有可能从另一个以前想得不多的方面受挫。总之，物极必反，所以要见好就收。并且，建立生育政策花了十几年，要想平稳地调整和改变这个政策，也不是容易的事。

作为人口学者，我甚至认为 TFR 就是 1.8 也已经低于更替水平很多了，也应该着手考虑调整政策。如果真要达到现行生育政策要求的 TFR (1.5) 才考虑调整政策，那就太迟了，也太过了。其实现行生育政策不是一个长远人口政策，只是一个矫枉必须过正的时期性政策。因此，特别要把握时机，不要真的过正太多。另外，现在总有人说，人口发展要服从经济发展。我认为，这只是在长远方向保持一致的意义上才是正确的。由于经济周期比人口周期短得多，所以人口发展只能从长远角度考虑。并且，人口发展有自己的规律，是不能违反的，它本身就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

上述节选内容的第三段其实已经涉及是否可以将 1.8 生育率维持更长时间

间的问题了。但当时我没有更深入的研究，只是凭学术直觉而发的议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一直拖到最近两年才有了一些推进。

这个预测最终是按照指定的生育率参数完成了，但是我在研究报告中的基础数据和参数评价部分，专门指出这个预测的高中低方案的2000年底人口规模均显著高于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数字，并且对预测结果与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在年龄结构、育龄妇女孩次结构、少儿人口的独生子女比例方面做了细致的比较分析，揭示出两者之间差别非常显著。这实际上表达了我对预测中使用的生育率参数定得过高的质疑，并且我在子课题报告摘要中明确指出：“……因此所有方案的预测总人口将处于更保险的一侧，但可能导致对老龄化程度的估计不足。”^①

通过参加这个预测研究，我就明白了，生育率估计上的争论已经不是一般的学术争论，政府主管部门实际上已经深深地参与其中，在导向和评判等方面施加了巨大影响。由于我对生育率持另类看法，以后的研究就不会再是象牙塔里的雕琢，坚持己见就少不了要得罪人了。

九 揭露“生育率显著反弹”的真相

在对我国人口形势的判断上，近年人口学和计划生育领域发生的一件影响重大的事不能不提。2006年9月进行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结果显示，生育率在2004~2006年发生了极为显著的大幅反弹，调查前一年中的总和生育率甚至飙升到1.87的水平。这种结果与其他近年人口调查的低生育率结果（包括一年前刚进行的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未经调整的总和生育率不过为1.34）全然不同，简直是鹤立鸡群，自然极大地震动了人口学界和计划生育领域。按说，对这样一个孤零零的调查结果应该慎重一些，然而在尚未开展深入的数据分析之前，这个调查结果就被作为证据大造人口形势严峻、生育率严重反弹的舆论。

2007年春，国家人口计生委组织了一批人口学者对该调查的原始数据进行开发研究，我和另外两位学者受命各自独立地进行生育率分析。尽管数据计算的确得出上述生育率反弹的结果，然而我们三个人从不同角度分别发现这个调查数据样本的分布异常。这实际上表明，上述生育率的异常升高的结果极有可能是由于调查中的抽样偏差所致，也就是说这种调查结

^①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人口预测模拟报告》，载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编《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上）》，中国人口出版社，2007，第1002页。